

大陸印象記(上)

——我見我聞我思

●白也詩(某大學哲學研究所講座教授)

一橋一橋分別道來

睽別了四十餘年的故鄉怎能不寤寐求之？算起故鄉之親友大半都已死亡，或者其下落不明，縱然返回故鄉，也難免是一場觸目驚心傷感之旅而已。但是我畢竟在民國七十九年八月廿八日從美國舊金山搭華航飛機到香港去了上海。上海是我在大陸上最後任職的處所，也是我亡妻的出生地。我和我的家住在上海前後有十年之久。僅次於南京，是我第三故鄉。

在上海我會見久別的親友，遊覽了市區，訪問了靜安寺和玉佛寺。在九月六日直飛北京。在北京除去爲了中國的和平統一會見一些舊雨新知，我遊遍了市區和郊區十大名勝：包括了登上八達嶺長城；看了明十三陵的定陵；跨越了七七事變的蘆溝橋。至於天安門廣場、頤和園去了不止一次。因爲我想起了英哲羅素在他的「自傳」中，曾說到在一九二〇年胡適帶他逛了八大胡同，我便特意請了一位生長在北京，現任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張先生，陪我逛了八大胡同和天橋。可惜，不幸，天橋已經闢成寬廣的馬路，往日騷人墨

客所記載的形形式式的攤販，江湖賣藝的男女演員、京劇中的草台戲等等，已經蕩然無存。至於

八大胡同不僅名稱有的已經改了，其內容和氣氛也大大地變了。其髒亂不異貧民窟。一絲羅曼迪克的景象和脂粉味道都沒有了。我的朋友一再指揮計程車東轉西轉，左彎右彎，並指點一些危樓、窄巷、破窗、歪門，告訴我這是「楊梅竹斜街」，那是「石頭胡同」、「小石頭胡同」等等。又說小鳳仙和蔡松坡便住在那樓上。說時遲，車行快，我只瞥見一個小小暗巷中矮矮的小樓一角，可是我在遐想那位領導二次革命，打倒袁世凱洪憲帝制的叱咤風雲的丈八英雄，曾一度藏身在此勾欄之中，那裏說得上是美人窟呢？

我在北京住了兩週，吃了一些北京烤鴨和海蔘筵席。郊外旅遊有公家單位的車子免費招待，可是我的觀感使我對於當前中共政權的顛預無知，自我欺騙已經不勝憤慨，同時對於中國民族的前途又不禁憂心忡忡。爲了醒目起見，我將我的大陸之行的印象和感想，一橋一橋分別道來。

四十年未聞的奇香

拗不過朋友的慫恿，同時爲了回報他們對我提供的招待。我們逛了上海豫園，並且在豫園的攬波樓用餐。四十多年前的豫園是上海潘家的私家花園。我的模糊印象是一座人工建造的花園，幽靜，佔地很大，樓閣廳堂十分寬敞的花園，四季都有花卉。那兒有人力架設的小橋，人力開鑿的池塘，更有假山和藤架，相映成趣。可是現在變成了公園。在園內有國營的照像館，各種小吃館如南翔饅頭等等，各種專爲觀光客購買土產和紀念品的小商店。更有一些出售時髦衣着、女子鞋襪的商店。把這個小小的花園變成了中共賺取外匯的市場。因爲豫園成爲觀光客必遊的勝地，導遊人不惜特意爲我指點那些藝術品展覽室、那座茶館、那家飯店，是英國女王伊麗莎伯到過的。

正當我們跨越拱橋（拱橋下金魚正在戲水），走向攬波樓時，看見一位中年姑娘（上海人稱呼女傭）左右手拎着兩隻馬桶，那桶雖然已經褪色，我仍舊看見那是一對描金的富貴牡丹桶。那姑娘向我們走來，我也正在注視這位手提與我久違的馬桶的姑娘。我心中想到她將如何處治時，鳳兒拉着我，讓路給她走過。雖然我們交臂而過

，我並未聞到什麼。可是正當走向攪波樓時，那四十年來未曾聞過的奇臭，使我喉嚨感到一陣強烈的刺激。就是在事隔三個月的今天，那種強烈的惡臭的回憶，仍然使我覺得噁心。我掉頭一看，那娘姨正在用她手中的刷子，借用在路旁公共的水龍頭，洗刷馬桶。原來她把那兩桶糞便傾倒到露天的陽溝裏，並且用那馬桶、一桶一桶接了水，沖洗那陽溝。她這樣子做，無異丟了一顆惡臭的炸彈，使牠的威力迅速遠播。鳳兒和汪君、吳君趕快把我推推拉拉，跨入攪波樓的門限，走向樓梯。

攪波樓據云英國女王曾在此樓上飲茶，因此樓柱仰塵藻井上繪製的盤龍圖（這必然是中共近年來增加的），又重行加漆着色，所以看來渾然一新。女侍出示菜單時，極不友善。當那位在上海市政府任職的汪君說我是台灣來的貴賓，那女侍並不因此變色改容，只是冷冷的說道：「得付外匯券啦！」

吃的只是八樣點心：小籠包子、燒賣、春捲、蝦餃、粉圓等等，外加鷄球、鱈糊炒麵，共計外匯券一百九十餘元。算成美金不下四十多美金，我們一共六個人算來不算太貴，每人只花了七塊美金。可是拿大陸上人民收入來算，一位中收入的人每月薪水不過一百四五十元人民幣。一餐之費需要一個多月的收入，則未免太貴了。吳先生當面責怪汪先生不應道出我是來自台灣的貴賓，逼得我不得不付出美金的旅行支票。當我解釋給他們聽我是旅遊的人，目的便在花點錢，享受多年不曾嚐過的家鄉風味。希望使他們釋懷花費

了少數美金。可是我不能忘懷飯前所聞的那四十年來未曾聞過的奇臭。我便指着汪先生說：「這四十多年來上海市究竟搞些什麼？為甚麼天天高喊現代化，到如今仍然有娘姨當街倒馬桶這種事。」汪君默然。吳君和李君伉儷異口同聲的說：「今天碰巧遇見了這件事而已。」

貴族區多變貧民窟

在大陸上同胞的貧窮和生活水準的低落最顯著的例子，莫過居住空間的狹小。住在上海身為上海××醫院的內科主任，曾到旅館裏來看我，在大飯店裏請我吃一桌十二道菜的豪華筵席，但是他們夫婦和錦繡華年的雙胞胎女兒絕口不提，請我到他們家中吃飯。為此我特別向他們提出要吃大鬧蟹，因為在菜館吃不到，所以我害得他夫人早上六點鐘排隊買了六隻蟹和兩瓶啤酒，請我到他們家中吃中飯。我進入那公寓三樓，踏入他們寓所時，才恍然大悟為甚麼他們在此以前不曾請我去他們家中的原因。

我一走進了門在走向二小間和半間廁所時，沿着牆壁堆滿了箱籠和角几，角几到天花板之間堆的都是東西。仰塵上下垂的小電燈大概是十支光的，所以室內昏黯不明。左轉便是一大間向弄堂開着窗戶，靠牆壁放着一張雙人床，窗下放了一張三人坐的長沙發，房中央有一張八仙桌，三面有長凳，一面要沿床邊坐，如此一來房間已經滿了。換言之，這間房既是兩位雙胞胎女兒的臥室，又是會客室，又是餐廳，與此相對的便是他們老夫老妻的小小臥室。在這兩間房子之間有

一小小廚房，廚房的隔壁是個廁所，廁所裏有一破舊搪磁浴缸。但是因為那通浴缸的自來水管久已鏽得腐爛，不敢放水，所以他們在浴缸和廁所旁儲水備用。就連廚房燒菜，也得用那儲水桶裏的水。

我的朋友所住的區域原是上海法租界最考究的貴族區。因為四十二年不曾油漆修理，再加上每一家住戶忽然增加三四倍或者五六倍人口，而公共設施如水電等等不會比例增加其供應量，所以那貴族區淪為貧民窟。又我前在英租界的住宅、樓上樓下大小房間八九間包括亭子間，經我訪問，現有六家人家住在那裏面。

我的訪問也使我觸目驚心。應門的便是那位經我委託看管房屋某神的姊姊，身軀尙健，步履艱難，白髮鬢鬢，說話時氣喘。當她認出我便是屋主，不禁泫然淚下。敝說她的弟弟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如何遭受虐待。曾經入獄坐牢五年。在外就醫時，仍然逃不了紅衛兵登門辱罵。罰他跪在聖像前，宣佈退出教會。如此不出三天，她的弟弟便被逼身亡。

她說着邀我進去看看。此時樓上樓下已經有人打開窗戶或者隔扇探頭張望。我所看到的是一羣老弱男女，看來他們的年齡未必比我大，可是已經衰老得不成人形。我便悵然走出我的舊家門，不勝唏噓感嘆，這四十餘年來中國人所經歷的滄桑歲月。

據說上海市區居住問題最嚴重，因為當中共攫取大陸時，大上海的人口已超過一千萬，再加上每天流動人口二三百萬，共幹根據當時上海可

居住的房屋的面積，分配給已住在上海市區的人口。一個人大概分配到三十平方公尺。所以我的房子有六個家庭三十餘口男女老少住在裏面，走到外灘一帶及租界時代的公務區域，也看到有人家住任辦公室樓上。在窗外看見男女老少的內衣褲，晾在露天陽台上。現在外灘上、外擺渡橋一帶有更多船隻密密靠在岸邊，船上人頭鑽動，必然有人長期住在船上。

到了北京看見有許多一幢一幢高到一兩十層的辦公大樓和住宅大樓，我以為北京人住的問題不至於像在上海那樣緊張。我曾去看了前在××大學的老同事，他雖身為「中國×××研究所」主任，他的住處却擁擠不堪，只能在樓梯口小小空間裏，放一小方桌子，八個人擠在一起用餐。可是我到「中國×××院長家吃飯，看見家俱陳設雖極平常，但房間寬大，有客廳、餐廳、書房、臥室等等。上下電梯有一婦女經常坐在梯內，掌管一切。似乎是公家耳目，所以監視該棟大樓住戶與訪客的出入。

至於中共高級官員皆集中住在中南海。中南海在天安門之北，舊皇宮大內之西。原是皇帝休閒棲息之所。圍以百仞宮牆與外界隔絕，可說是紫禁城中的紫禁城。因為中南海是禁地，遊人莫入，所以不知其詳。以中南海幅員之大，想來那些中共的要員居住所佔的面積恐怕在全國是最寬廣的。

所以我說在共產黨統治下的人家居住的面積與其主人的官階大小成正比。這不是假象，這是真象，這是中共製造出來的。

繁榮假象令人憂心

我此次回大陸只到了上海和北京。這兩個城市人口最多，商店也相對的比較多，所以造成了這兩個城市繁榮的假象。

在上海國營的小商店滿街皆是所謂個體戶，只能在弄堂口開個小館子，或者在弄堂口搭個小篷子，掛些衣服出賣。有時也佔了些人行道補鞋子、補用具而已。恐怕在大陸上名副其實的個體戶是那些成千上萬的跑單幫的人。有一次我找到上海南京路大新公司後街上一家廣式飲茶酒店。好像新蓋在廢墟上一排平房。走進去香煙氣味噴人，地上髒亂礙腳，但是坐無虛席。好不容易經過酒店小妹情商找到三個圓凳，和三位男士一位女士拚了一個圓桌子。那些男士捲了褲腳子，把腳踩在長凳上，滿臉江湖氣色，一口寧波腔調。其中一位因為鍋貼水餃內餡的肉味道不對，一口將水餃吐在桌上，喊來管賬的女掌櫃，開口叫罵。左邊坐的是蝶兒、右邊坐的是鳳兒，我忍不住向那位男子說道：「好男不與女鬥。」那位開口罵人的口操寧波腔，向他的同伴說道：「這位是從美國來的，會作報告，最好不要理他。」我不懂懂他的話，並且模仿他的口音，告訴他：「雖然我美國動身來的，但是我是中國人，並且是道地的上海人。」我歷舉我前往上海的地址和我在上海服務的機關和職位，他們相信了，開始對我們和善了。

為了掩飾他剛纔粗暴的言行，他說：「今日誰有錢，誰便是大爺。我不屬於任何單位，我靠

跑單幫賺錢，自食其力。不像這一班紅小鬼，靠了從前門爭父母和老師，今日才獲得這個美差事，當上了經理、會計師、業務員等等，利用上級關係，佔用公共房屋、開餐廳，賺大錢。」於是我在旁好言相勸，使他息怒寬恕了那位女經理，她正在向他申辯，並且說了那鍋貼水餃，不算賬。那三男一女的氣也就平息了。

坐在那位罵人的寧波客旁的女士，也開始吐苦水，她說：她是演紹興戲的女演員，她的薪水不到那女經理的一半。因為她的職業是清閑性質，受盡了冷落和屈辱。這年頭吃是最重要，誰人有功夫去看戲。加上地方幹部安排她參加勞軍和義演，演員能把肚子混飽已經是很幸運。一旦不如幹部的意，他們可派上她任何罪狀，把她調職使她失業。據她說，在大陸上沒有所謂「自由職業者」。在大陸上的人不僅沒有自由，並且要靠政府指派他們的工作或任務，纔能生存下去。所以在桌上吃飯的人無不是一肚子苦水要想傾吐一下。總之，他們恨的是那個政權和那個政權所設置機關，和那些機關中所雇用的人員。他們藉鍋貼水餃肉餡不新鮮，發了脾氣。只是宣洩他們心中的怨氣而已。他們也不憚煩的告訴我，他們如何跑單幫，如何先集資，如何到鄉間找那些從事手工藝或者半手工藝的人家下了訂單，再到城市裏找那些在弄堂口或者夜市或者跳蚤市場上的個體戶，講好批發價他們按時收集男女及幼童的衣着和賤價的家庭日用品，綁在自行車上，或者用併裝的麵包車（形似長麵包的小貨車）運進城市販賣。當運氣好的時候一個月能賺上五百或一千

人民幣。可是他們必得買通貨品產地的鄉村幹部，更要孝敬在城市裏管理市場的幹部。如此一來大概每月能實賺三四百元，所以他們能像今天這樣的來到國營廣式茶館來飲茶，他們也好像是抱歉，在囁咕着：不想遇到這樣尷尬的場面。

到了北京我刻意去王府井大街、西單北街和前門一帶來百貨公司觀光。那些商店規模不小，佔有四五層大樓，分爲若干專櫃，琳瑯滿目，花樣繁多。粗粗看來，百貨公司裏熙來攘往，煞是熱鬧。一加省察買貨的人並不多；再走近聽得買者的口音，十之八九是台灣來的觀光客、中東阿拉伯人和少數歐洲人。台灣來的觀光客恐怕是近一年來到大陸上最多的外國人。（大陸上當局者口上喊「同胞」，實際上視之爲外國人，因爲他們要用「外匯券」。）中東阿拉伯人（尤多伊朗人）皆因陪同運動選手來大陸觀光。歐洲人純爲觀光來此，這些買東西的人所買的十之八九是紀念品，帶回家送朋友而已。

大陸上不管是手工藝品、半手工藝品或者機器產品，皆嫌其粗製濫造。式樣大都仿古，但是仿古而失去原製作的優點（例如磁器、漆器及雕刻物品）。更有一些企圖投外國人所好的新樣式，但是往往是畫虎不成。如磁器在製作樣式上不如日本人產品能獲得西方人的喜愛。因爲以上種種原因，在大陸上大批百貨公司所陳列的產品引不起外來觀光客購買。那些專爲當地婦女所生產的衣着鞋襪，既不時髦，又少有選擇的機會。恐怕因此而滯售。但是最重要的滯銷的原因是在大陸上的老百姓袋內無錢，買不起那些東西。

賺取外匯目的何在

以大陸上工資政策而論，他們並不刻意要在國內建立一個消費市場。中共當局只是一心一意的要賺取外匯，不注重人民的福利（提高生活水平）。然則，他們賺取外匯的目的何在？他們不是爲人民提高所得，改善生活而爭取賺得外匯，他們是爲了增加和擴充他們的國營事業。而國營事業也便是中國共產黨的黨營事業。並且利用中國人辛勞所得發展國防工業，以鞏固其政權。或者出售他們的武器給交戰國雙方（如中共曾同時提供伊朗和伊拉克的火箭），破壞世界和平，以收漁人之利。更爲的是嚇阻在大陸上或者在海外的中國民主人士，從事政變或者推翻中共政權。從這個觀點來看，目前企圖對中共恢復巨額貸款的日和歐市國家所爲，誠然是不智之舉。

前云中共賺取外匯目的不在提高人民所得，改善人民生活，可以從中共的工資政策看出來，中共對幹部和一般人民顯然實行差別待遇。紅軍的俸給和福利暫時不談（紅軍除正規俸給和福利外，更有種種特許。例如中共允許紅軍機關可以利用公家汽車經營交通事業，利用公家房舍經營旅館事業等等）。凡是曾經爲中共政權出過力的都取得某種特權。就連專做中共耳目的里弄的幹部（都爲中年及中年以上的婦女），也獲得某種特許。例如，我在西單北街看見一中年婦女，手中拿着繩索，在百貨公司前人行道上，把繩子扣在四棵街樹之間，形成一長方形地區，專供停放自行車，她按鐘點收費。她可隨時放大的地盤

，容納更多的自行車。行路的人雖然覺得不便，但無人敢抗議。又如在北京市區內的高樓大廈作辦公室或者公寓用的皆有電梯。操作電梯的以婦女居多。在電梯內她們有椅子坐，並且有茶水供應。她們一方面操作電梯，一方面觀察和記錄進出人等。遇到可疑的必然向上級報告。這些人的待遇每月多少人民幣無從得知，但是他們的工作是特許的，生活是有保障的。

至於其他一般非共產黨的農工階級的成員和公務人員的薪給非常微薄，可說是免於饑餓，差堪溫飽而已。在西單北大街最大的生鮮市場，看見一些冰凍的魚蝦。在某一禮拜天早上九時，我看見論筐的活蝦傾倒在鉛盤裏，有些家庭主婦看了看價錢，便頹然而去了，因爲那售價超過她們的購買力。像一個月的收入不超過二百元人民幣的人家，每天家中開支不能超過六、七元人民幣。試問他們如何能買得起每斤廿元人民幣的鮮蝦？（下期續完）

吳大猷博士來函

編輯先生大鑒，頃讀 貴刊「中外雜誌」第二八五期第六十四頁，劉兆田先生文「又談名人名聯」，其第三欄第一、二行謂張學良於民國十七年元旦在東北普遍懸掛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按此乃十七年十二月廿九日事，非該年元旦也，事關歷史事實，似宜作更正。

崇此 卽頌

撰祺 吳大猷啓 七十九年十二月七日